

七十年代,火车入黔

——一个支内者家属的回忆

谈瀛洲

正常即理想

朱生坚

“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过一个周末,然后重新体味一下过去每一天每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的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珍贵。” ——上海援鄂医生钟鸣

他难忘的经历,就照原样抄在这里:
我记得有一次在解剖室,我和生教讲师一起复习人体构件,他问我某条神经是什么神经,而我不知道。他告诉了我,然后我提出异议,因为神经所在的位置不对。然而他坚持认为那就是我一直找却没有找到的那条神经。我抱怨这样的异常情况,他则笑着说,在解剖学上,不普通的也是正常的。当时我真是被惹恼了,但是这句话印在了我的心底。从那以后我就被迫认识到,这句话适用于解剖学,对人而言亦然。正常是你只能极少发现的情形。正常是个理想。
这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鲁迅和毛姆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一个是审美上的理想主义,一个是认知上的理想主义。然而,医学或解剖学却是自然主义的。至于生活,按照毛姆的领悟,只能说是现实主义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人或多或少有些不正常,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如此;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理想的人。这是所谓“正常即理想”的第一层意思。
由此,也要求我们调整对“理想”的认识,不要把理想放在遥远的未来,好像跟眼前的生活没有关系似的。所谓理想的生活,无非就是正常的生活,如此而已。只不过,悖谬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生活又或多或少是有些不正常的。正常的生活,就是理想的生活,它既不是遥不可及,而又总是有所欠缺,带有一点不正常。而这就已经转到了“正常即理想”的第二层意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首位上海援鄂医生钟鸣接受视频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疫情过了之后您第一件事想做什么?”他想了想,眼睛有点红,把头往上仰了仰:“我想去平常地上一天班,我想平常地过一个周末,然后重新体味一下过去每一天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么重要的这么珍惜的平凡的生活,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珍贵。”
我不知道这段话曾经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真的,说什么诗和远方,正常的生活已然来之不易,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它又是多么脆弱,简直不堪一击。然而,我不知道,等到疫情过去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还会真正体认“正常即理想”,而安住于当下。
当然,这并不是让人放弃理想。如果毛姆所说的意思仅此于此,相当于把理想主义改写为正常主义、平庸主义,终究让人有点不甘心,让人觉得善则善矣,未尽善也。就在上面这段话后面,我们看到,尽管毛姆一再让我们接受人的多样性,换言之,也就是接受人的不完美性,最后,他终于也说道:
我不认为说名人的缺点应当被忽略的人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了解它们。然后,尽管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一样明显的缺点,我们也能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获得和他们一样的优点。
如此,也就是“正常即理想”的第三层意思,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希望把带有一些不正常的正常生活转变成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并且不断努力。

医生这个行业给社会的贡献可不只是治病救人,它还贡献作家,比如鲁迅,比如余华;还贡献歌手,比如罗大佑;还贡献漫画家,比如小林;还贡献“段子手”,比如张文宏——他让人安心,又让人开心,也许还让人痴心。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医生转身做艺术家,就像古话说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
同样有过学医经历的毛姆给出了答案。他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在医生的行当里消磨几年更好的训练了。”虽然在律师的办公室里也可以了解人性,可是在那儿,人会控制自己,会撒谎。但是在医生面前,不管脱不脱衣服,病人都是赤裸裸的。“大多数情况下,恐惧会击穿每一道防线,甚至虚荣心也会被它夺去力量。”用不着盘根问底,病人就会说出比医生想要知道的更多的东西。
说到这里,是不应该把余华从上面的名单里删除呢?因为他原先是牙医,他的病人大概没有多少机会对他倾诉自己。再者,准确地说,鲁迅也没有真正做过医生,他只是做过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改行了。倘若毛姆所言真实不虚,那么,天晓得,要是鲁迅有几年行医经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会更犀利到什么程度——如此说来,没有当过医生的鲁迅,对人生的洞察,确实有过人的禀赋。
说起鲁迅学医,我们都知道他自己记述的一则轶事,就是解剖学的藤野先生指出他(周树人君)所画的下臂解剖图上的一个错误:“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这里颇令人疑心,鲁迅在写作的时候,也许是记忆出错,也许是有意无意的——就像当初移动血管位置——借藤野先生的口,说出了自己原先的想法。我们有理由猜想,“穿衣服太模胡”、“会忘记带领结”的藤野先生未必能想到,这位周树人君乃是顺从了自己的艺术冲动,为的是把血管画得“比较的好看些”。医学不管好不好看,而把解剖图故意画错了的美术爱好者注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在医院实习中的毛姆也有一个让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遗失在梦中的记忆 No.3 (水印木刻) 马建鹏



作者与父母、二姐在医院大楼前



作者与父母和大姐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上,也会坐上一两个人。他们脏兮兮的脚,就垂在你的边上。

二
火车到李家湾站是在半夜,只停两分钟。而且因为是在基地附近,为了“保密”或“安全”起见,车站不许亮灯。因此大家都很焦虑,怕错过了站,怕到了站来不及把行李搬下车。他们的焦虑情绪也传染给了我。
傍晚时,疲惫不堪的我躺在姐姐的膝盖上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大哭,而且是属于上海人叫“发魔”的那种,也就是小孩子毫无理由地在睡觉中大哭大闹。可怜的二姐,看着我束手无策。她那时也是个孩子啊,却要照顾我这个小小孩子。
等我清醒过来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慢慢平静下来了。后来想到站后,人和行李也都下了车,没发生什么事。现在想想,两分钟并没有那么短,只是在那种特殊情形下,大家都特别紧张罢了。

三
第二次去贵州后,一直住到要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父母觉得上海的学校教育质量好些,所以我又回到上海的祖父母家。
回程可比去程还要糟糕多了。因为李家湾站并非起点站,买不到坐票。
在那里上车如同打仗。一个人走,许多人去送。原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火车到站后,先把人和行李“塞”上车再说。
我用“塞”这个字完全贴切,因为火车从重庆开到李家湾,已经很挤了。要再挤更多的人和行李,只能靠“塞”,而且停车时间又短,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把人和行李弄上车,不管是从车厢门还是从窗口都可以。
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先从车厢门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口,在两边座位上的乘客的抗议声中,把行李接进去,有的时候,还要把人也接进去。像我这样的小孩,从车门口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挤上去的,就靠别人把我举起来从窗口递进去。
因为怕我们在车上没法睡觉,我爸妈想了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和几个出差的同事同行。因为当时只有出差的人凭单位介绍信可以买卧铺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白天不睡觉的时候,去他们那里睡一会。
于是有一次,我在卧铺车厢睡觉,在往坐铺车厢走的路程上,被巡查票的乘务员拦住了。票子在大家那里,我身上没有票,于是就一批盲流模样的人,被带到乘务员办公室,一个个地处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在坐铺车厢有座,只是去卧铺车厢睡了一觉。也许是小孩子嚷嚷噘嘴说不清楚,我发现乘务员并没有在听,只是说,“那就要补一张票呀。”小孩子身边没有钱,怎么补票呀?!正在这时,我爸妈的一个同事拿着水杯去锅炉间加热水,看到我了,跟乘务员说明

情况,就把我带走了。
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要是我爸妈的那个同事没看到我,会怎样呢?被赶下车,送去收容所,在当时,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四
读小学以后还是会去贵州,但仅限于在暑假,和姐姐们一起去探亲。不过1977年那年暑假去了以后不想回沪,在那里待了半年多,直到完暑假才又回沪。在这半年里爸妈会教我一点,我自己会做完教材上的习题。那时“文革”刚结束,教育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回到上海的小学后也没人问我要成绩单,顺利地升了级。
1973年以后,湘黔铁路通车,上海到李家湾的路程缩短了,但也要三天三夜。因为大一些了,开始注意到沿线地貌,甚至是民居风格的变化,还带了本小本子记录了一些,画了一些稚拙的画,当然这本子现在早就没了。
火车离开上海,进入浙江境内以后,慢慢开始有山。进入江西,开始看到红土,有的地方是黄红色,有的地方是深灰色。进入湖南以后,会有广袤的平原,和大片大片的稻田。过了长沙以后,山就多了起来。邵阳与怀化之间,有许多多高峻的山。火车要钻好多山洞,有时过一个山洞要好几分钟。进入贵州以后,则连绵不断都是山了。

以前走黔桂线进贵州的时候,知道柳州是一个大的中站,现在走湘黔线,株洲又是一个大的中站。在这两个站,平行交叉的铁路特别多,火车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
到停得久的站,就可以下车走走,尤其是车站上设水龙头的,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把脸,擦下身,因为在火车上,总是发车后不久水就没了。在有的火车站,还能买到棒冰,比上海当时那种4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要大,有黄、红等不同颜色(现在想来都是各种色素)。能吃上一根这种棒冰,对我们小孩也是难得的享受。
火车在株洲站加水 and 补充其他各种东西,有时还会换个火车头。行驶在东部省份的时候,火车用的多是没烟囱的烧柴油的火车头,也就是当时报刊上反复宣传的“国产内燃机车”。但到了内陆,就会换上燃煤的,有个冒烟的烟囱的那种蒸汽机车,今天也许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那种去霍格沃茨的火车头。看上去虽然浪漫,但在这种火车头喷出的黑烟里,其实包含大量的煤灰。
我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有一年去贵州,坐的车厢离火车头比较近。一开始还挺高兴,因为火车在转弯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火车头和它的三对巨大的动轮在“吭哧吭哧”地运转,这让年幼的我着迷。
但随后就发现,这种时候火车头的烟也会飘到我的脸上,被吸入鼻孔。在火车过山洞时,憋在洞里的烟会灌入车厢,整个车厢烟雾弥漫。到李家湾下车时,整个人都已被这煤烟熏得灰头土脸。接下来好几天,都能从鼻子里抠出来黑黑的煤灰。
今天的高铁的轨道是无缝连接,当时的铁轨却不是。为给热胀冷缩留下余地,每段铁轨之间都留一个空隙,火车车轮驶过,便不断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车厢也不断在微微晃动。刚上车的时候,觉得这声音特别吵,时间久了,反而觉得它有一种催眠作用。下车之后几天,躺在床上或身处室内,都有床或房间在微微晃动,同时“吭哧”作响的幻觉。
最讨厌的是车厢里的广播。有时睡得正熟,就被早6点就开始播音的喇叭吵醒,而且音量很大,然后聒噪一个白天。有一次我坐在这喇叭附近,发现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我就关了。结果马上有人生气地过来把它打开。这些人习惯了噪音的陪伴。

五
去贵州之前都是打电报通知爸妈到达日期、时间和车次,打到一个神秘

的、地图上不存在的叫“凯山”的地方,爸妈知道了就会跟医院说,派一辆解放牌卡车,也就是平时派出去拉煤的那种。到了把行李搬到车斗以后,人也爬上去,站在敞开的车斗里被拉回医院。当时感觉还很兴奋,因为坐卡车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客车或吉普车似乎是稀奇东西,很少看见。
回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差的人带,上车了就要去问有座位的人,到哪个车站下车?小孩子还睡懵,有的时候还不大好意思开口去问。碰到下车比较早的,就去守在他旁边,等他下车了赶紧坐下去。
夏天去贵州的话,路上的主要痛苦是炎热。火车要经过的杭州、南昌、长沙,都是酷热之地。当时空调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解暑全靠车厢走廊上方的一台台小电扇。
冬天去贵州的话,则因为怕冷,大家都关着窗,一晚上下来,车厢里的劣质烟味、人的汗臭味、厕所里散出的尿臭味混杂在一起,气味真是可怕。
不管是哪个季节,火车的厕所总是特别的脏,常常是尿尿横流,要进去简直是无法下脚。因为车一挤以后,用水的人多,车上很快就没了水,就无法冲厕所了。但即使是这样污秽的厕所,有的时候还上不了,因为在车最挤的时候,里面也睡了人。

六
最受煎熬的一次,是在火车上坐了六天六夜。火车已经到了贵州境内,最后却又被拉回了上海。
因为湘黔线沿线多高山、峡谷、河流、山洞,刚通车那几年,常听说发生塌方和桥梁被泥石流冲垮等事故。没想到自己后来还碰到一次。
我不确切地记得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我那时候已经进了初中,也是和我二姐一起去爸妈那里度暑假。玉屏是湘黔线进入贵州境内以后的第一个车站。我们坐的趟车到了玉屏站后,就停下了不走。这时那哇哇哇的广播也不作任何正式的解释和通报,只是听大家纷纷传说,说前面发生了塌方的,也有说洪水冲走了桥梁的,所以火车无法前行。没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那还是前手机时代。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话也很少。玉屏当时也是个简陋至极的小站,只有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站台上跑来跑去,也不提供电话给乘客打。所以我们既无法通知前方的父母,也无法通知上海的家人。
就这样坐在车上苦熬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来了消息:列车原路驶回上海。这时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半了。再坐两天半返回上海?这前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但没办法,只能苦熬。
现在有时回想,如果那时候我们再大一点,应变能力又更强一点,也许可以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虽然火车要开走,但我们可不可以下了车留在玉屏站不走,等铁路修通以后坐后面的火车去李家湾。但再一想也不行:一是当时我姐和我身边没什么钱;二是即便有钱,也无法住宾馆或招待所,那时候这些地方都是要介绍信才能住的;三是也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知道前方的铁路什么时候能修通。再说即便到了李家湾,也无法通知父母,我们不知道路路,也无法找到有半小时车程、无任何交通工具可达的父母的医院。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这202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理解那时候的许多事情,要发挥些想象力才行吧?

后来听我爸妈说,他们在李家湾火车站等得心急如焚,等了一天,怎么还不来?第二天又去等,还是不来。一直等了三天。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何时得到的消息,说是有大桥被洪水冲垮,所以列车过不来了。
我和二姐精疲力竭地回到上海,迎接我们的是7月的灼热骄阳。因为当时是期待看到贵州有人来接的,所以我们带的是不便搬运的纸皮箱。那时上海火车站还有少量的三轮车出租,但一般人根本叫不上,结果我们只得扛着两个纸皮箱挤公交车。两个憔悴肮脏,在火车上有一个礼拜没洗澡的小孩,在公交车上也是被人侧目的。
公交车到站了离家还要走一段路,两个箱子越扛越重,到后来再也扛不动了,是放在地上踢着回家的。
到家了,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堂哥来开门的。事后他说,“那天我一开门,大吃一惊:怎么来了两个瘪三!”(注:瘪三,沪语“穷鬼”“流浪汉”的意思。)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达遵义。现在想起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现在,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达遵义。现在想起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现在,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达遵义。现在想起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现在,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达遵义。现在想起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现在,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达遵义。现在想起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现在,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